

在比較文學和翻譯的研究上，作者有著自己精闢獨到的見解，不僅論之有據而且廣徵博引。

本書引進、借鑑國外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分析、探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現況與問題，從而尋求、開拓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對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的重新確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比較文學

與

翻譯研究

謝天振

著



【新知叢刊1033】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謝天振◎著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謝天振著。--
初版。--臺北市：業強，1994[民83]
面；公分。--(新知叢刊；1033)
ISBN 957-683-237-3(平裝)

1. 文學-比較研究-論文，講詞等
2. 翻譯-論文，講詞等



A0739837

810.7

83004758



新知叢刊 1033

I-173
x523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作 者：謝天振

出 版 者：業強出版社

發 行 人：陳春雄

執行主編：張碧珠

責任編輯：朱淑芬、賴桂枝

美 編：潘俊傑

地 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 話：(02)3043152(代表號)

傳 真：(02)3043153

郵 撥：0743812-9 業強出版社

聯合發行中心

地 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樓

電 話：(02)2183565(代表號)

傳 真：(02)2183619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永美印刷公司

定 價：新台幣 220 元整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 3220 號

1994 年 7 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3-237-3

序

賈植芳

天振把他近幾年發表的論文編了本集子，題爲《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將由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付梓前託我寫篇序文，我很樂意地答應了。

其實，天振的論文以前發表時我差不多每一篇都讀過。總的印象是：不趨時不媚俗，不尚空談，有感而發，言之有物，每論必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且論之有據，廣徵博引，視野開闊，資料翔實。現在把這些文章集在一起通讀一遍，又發現了作者更深一層的用意：引進、借鑑國外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分析、探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尋求、闡述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探索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前途，開拓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這是貫穿收入這部集子的十幾篇論文，也可以說，是貫穿天振最近十餘年來的教學與科研活動始終的一條紅線。

這種探索首先體現在作者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現狀的深入思考上。我至今還記得一九八七年在西安舉行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三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天振所作的一次大會發言。他在發言中尖銳地批評了當時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種模式化傾向，即在研究兩個中

外作家、或兩部作品、或兩種文學現象時，滿足於發現表面的「驚人的相似」，並把造成「深刻的差異」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社會背景不同」、「民族特性有別」等等。一九八七年正是國內比較文學開展得非常熱火朝天的時候，天振的發言儘管得到大多數與會代表的贊同，但也有少數人以爲他的發言未免「危言聳聽」（他的發言題目即是《中國比較文學：危機與轉機》）。然而，以後的事實證明，天振的發言絕不是無的放矢。四年以後，一九九一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針對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特地邀請中外著名比較文學家，組織兩次筆談會，其中議題即是對「X與Y模式」（抓住表面的相似現象進行牽強附會的比附）的分析與批判。天振參加筆談的文章即是收入這本論文集的《沒有「比較」的比較文學》，文章雖然不長，但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爲比較而比較」的錯誤傾向的分析批評，卻是頗中肯綮。

值得讚許的是，天振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某些錯誤傾向的分析沒有停留在一味的批評上，在批評的同時，他總是滿懷熱情地向人們指出「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在《危機與轉機》的發言中是如此，在《中國比較文學的最新走向》中更是如此。他結合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實際情況，具體提出了「比較詩學」、「中外文學關係」、「海外華人文學與留學生文學」、「跨學科研究」、「翻譯研究」、「神話、民間文學研究」、「東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文學的其他樣式的比較研究」、「文學史研究」等十個課題，這樣的治學態度對於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無疑是有啓迪意義的。

我在這裡要特別推荐天振對文學翻譯的研究成果。他從比較文學的立場出發，對反映在文學翻譯中的中外文化的衝突、變形、交融等現象，作了富有新意的詮釋。例如，他認為，從傳遞文化意象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文學作品中，把「Milky Way」翻譯成「牛奶路」比譯成「銀河」、「天河」還更為正確。這種觀點確實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見《文學翻譯與文化意象的傳遞》）

作為一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我尤其讚賞天振對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的分析。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魯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無不從翻譯文學中吸收到珍貴的養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翻譯文學，也就沒有由五四發端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文學理應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這點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本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研究家的一點共識。但是從五〇年代起，在當時封閉性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下，我們對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水乳交融的關係的認識漸漸模糊了，以致有意無意地把翻譯文學拒斥在中國文學史以外，這種做法是脫離歷史實際的。近年來，天振接連發表了好幾篇有關翻譯文學的論文，顯然是試圖扭動迄今為止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對翻譯文學的偏見。正如天振本人所說的，「對翻譯文學的理論界定，不僅牽涉到人們對翻譯家及其勞動的評價，它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翻譯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都有重要的直接意義。」現在，天振的這些論文結集出版，我希望它們能對重新確立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

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我和天振認識、交往已有十多個年頭了。說起來，還是比較文學把我倆連結在一起的。一九八三年，天振正在緊張地籌辦國內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中國比較文學》，而我恰巧是這本雜誌的編委之一，由於編輯工作的關係，我們認識了。之後不久，一九八五年，我們又結伴赴香港出席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國際比較文學討論會，並同住一個房間，真是同吃同住同進出，這樣我們就從認識變成了熟識。回滬後，我們的交往越來越經常化，終於發展為一對忘年之交。

天振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這一點在上海比較文學界，乃至全中國比較文學界，都是有口皆碑的。為了創辦中國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為了成立上海市比較文學研究會，為了推動中國比較文學活動的開展，多年來他默默地奉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每次比較文學會議，不論是上海的、還是全中國性的，他不僅提交論文，作大會發言，而且總是擔負著許多具體繁雜的組織工作和會務工作。但對於「位置」問題，諸如當什麼會長、副會長之類，他從不計較，從不去爭去奪，這在今天的時勢下，尤其難能可貴。我覺得他無論在做人或做學問上，他的文格與人格是一致的。「物以類聚，人以羣分」，這也就是我們能由同行而成為朋友的根本因由。

同樣感人至深的是天振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事業的執著追求。天振屬「文革」以後開始從

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青年一代學者。當時，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剛剛重新崛起，搞比較文學成爲一時風尚，一門「顯學」，從業者可以說是多如過江之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更主要的，也許是面對這幾年經濟大潮的猛烈衝擊，不少人「落荒」而走，穿徑而去，或「下海」經商，或出洋打工，熱鬧一時的比較文學「熱」也漸趨冷卻。但天振卻不爲所動，一如既往，默默地在比較文學的園地內埋頭耕耘。他先後參與編寫了《中西比較文學教程》、《比較文學史》、《中西比較文學手冊》、《比較文學三百篇》，翻譯了《比較文學引論》、《當代國外文學理論流派》，發表了數十篇比較文學的論文。他還完成了大型工具書《中國翻譯文學寶庫》（主編）、《文學百科辭典》（三主編之一）和論文集《俄國形式論》（主編）。目前，他正在撰寫專著《譯介學》和《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不難預料，憑著自己的勤奮與執著追求，天振一定能在比較文學領域內取得更大的成績，爲中國比較文學事業的發展，爲讓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確立，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是爲序。

一九九三年十月上旬，在上海寓所

前言

收入這本集子的十八篇文章，除了五篇寫於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間，其餘都是近幾年發表的。按其內容分爲三組：第一組是對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理論與研究現狀的思考；第二組是對海外比較文學理論的分析與評述；第三組是翻譯研究。最後一組全部寫於最近三年。這些論文反映了我的主要學術興趣和研究領域，同時也反映了我最近幾年來研究重點的轉移，即從以研究中外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爲主，轉到以運用比較文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翻譯爲主。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才首次聽說「比較文學」這個詞的，當時這個陌生的文學術語激起了我無比濃厚的興趣，我到處向人請教，四處搜尋資料，以便對它有更多的了解，還於次年嘗試著寫了《漫談比較文學》一文，這是比較文學在國內重新崛起以後國內最早介紹比較文學的三篇文章之一。但實際上，這篇文章只是自己學習比較文學的粗淺的心得體會罷了，寫得比較簡單，所以沒有收入這本集子。

一九八二年，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取得俄蘇文學碩士學位後，即留校並在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工作，同時受命籌辦中國大陸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中國比較文學》。經過一年多的努

力，雜誌於一九八四年創刊，我也從此踏上了研究比較文學的道路，並與比較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由於編輯《中國比較文學》的需要，我對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的研究現狀特別關心，並且由此引發出自己的思考。收入本書的第一組文章基本上都是這種思考的結果。其中，前五篇文章是對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實踐的分析和總結，以及對某些現象，如X+Y式的「比附」的批評，後二篇文章則試圖通過對文類學、主題學研究範圍、對象和方法的描述和探索，拓寬目前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路子。

比較文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一門開放性的學科，「閉門造車」是不可能作好比較文學研究的。因此，在留心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同時，我也花了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努力汲取和借鑑國外比較文學界的經驗。我利用我懂俄文的優勢，翻閱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寫下了評述前蘇聯和東歐比較文學的兩篇論文。感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和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比較文學系的熱情邀請，他們的邀請使我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一年有機會分別到這兩所大學進行為期八個月和半年的學術訪問，通過實地考察和接觸原始資料，寫下了評述臺灣和加拿大比較文學研究的兩篇論文。

書名「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很容易使人誤以為本書收入的是「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兩類論文，其實不然，本書所收入的翻譯研究論文也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論文。我之

所以在書名上標明「翻譯研究」，一方面是因為該部分論文在本書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是想以此突出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的密切關係及其在比較文學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學術界對從比較文學的立場出發研究翻譯，也即譯介學研究，了解不多，具體投入進行研究者更少。不僅如此，人們對之還有一種誤解，認為這種研究「脫離實際，沒有多大意義」。有一位語言學教授就曾當面向我提問：「讀了你的譯介學研究，人們的翻譯水平會提高嗎？」這位教授顯然把譯介學研究與一般的翻譯技巧研究混在一起了。其實，正如語言學的研究雖然不能直接影響人們的說話水平，但能深化人們對語言性質的認識一樣，譯介學研究雖不能對提高人們的翻譯水平產生直接的作用，但這種從比較文學立場出發的翻譯研究毫無疑問為人們觀察、認識某些文學翻譯現象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對於人們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學翻譯的性質有啓迪意義。本書中的《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誤譯：不同文化的誤解與誤釋》、《文學翻譯與文化意象的傳遞》三篇文章，即是試圖從這方面作一些探索。

自從發表了《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論翻譯文學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翻譯文學史：挑戰與前景》等論文以來，我對翻譯文學與翻譯文學史的觀點引起了一些反響，連遠在法國、加拿大、美國的一些學者都來信對我關於「翻譯文學不是外國文學，而是

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觀點感興趣，表示讚賞並索取有關論文，這並不是說「翻譯文學不是外國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觀點有什麼了不起，事實上我在論文中已不止一次地指出，這個觀點算不得我的「獨創」，類似的觀點大陸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已經有人提出，外國學者提出得更早。外界的興趣說明目前我們中國大陸從理論上對翻譯文學進行探討的文章還太少，而我發表這一組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以此吸引大陸同行對這一論題的注意。對翻譯文學的理論界定，不僅牽涉到人們對翻譯家及其勞動的評價，它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翻譯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撰寫，都有重要的直接意義。遺憾的是，我在這幾篇文章中對這一問題論述得還不夠透徹，我希望能在即將完稿的拙著《譯介學》中對這個問題作較為充分的闡述。

中國有句成語，叫作「敝帚自珍」，我覺得這句成語道出了中外文人普遍存在的一個情結。翻檢過去幾年發表的文稿，理智告訴我，這些文章其實「卑之無甚高論」，但在感情上又感到難以割捨，畢竟在寫作這些文字的時候，我是溶進了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思考的，即使有些思考還不太成熟。承蒙臺灣業強出版社社長陳春雄先生慨然允諾出版我的論文集，我就不揣簡陋，以往已經發表的論文中挑選出這十八篇文章，作為一份「作業」，奉獻給我的師長，也奉獻給一直鼓勵我、支持我的朋友和親人。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國比較文學：危機與轉機 / 1
第二章	中國比較文學的最新走向 / 13
第三章	《中國比較文學》：面對下一個十年 / 29
第四章	幾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 39
第五章	沒有「比較」的比較文學 / 45
第六章	文類學的研究範圍、對象和方法初探 / 49
第七章	論主題學研究 / 61
第八章	尋求新的起點——評臺灣比較文學研究 / 93
第九章	蘇聯比較文學：歷史、現狀和特點 / 105
第十章	東歐比較文學研究述評 / 121

第十一章	論加拿大比較文學研究及其發展前景	／ 141
第十二章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 157
第十三章	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	／ 175
第十四章	論翻譯文學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 193
第十五章	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	／ 205
第十六章	誤譯：不同文化的誤解與誤釋	／ 225
第十七章	文學翻譯與文化意象的傳遞	／ 239
第十八章	翻譯文學史：挑戰與前景	／ 263

第一章 中國比較文學：危機與轉機

我們中國人的心態一般都忌談危機，怕提危機，因為「危機」往往使人聯想到「大事不妙」。其實，從學術角度而言，如果某一個學科出現了危機意識，這未必意味著該學科即將完蛋，相反，它更可能意味著該學科即將躍向一個新的高度。這句話不敢說放諸所有學科都正確，但是對比較文學來說至少還是有一定根據的——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國際比較文學在韋勒克那篇教堂山講話之前和之後的情況就明白了。

正是針對這種情況，勃洛克指出：「有危機未必就是混亂和不協調」，「意識到這一危機——甚至自願接受這一危機，會導致產生一種創造性的努力。」①季羨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東方文學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也從學術角度給「危機」一詞注入了一股新意：「說某一學科產生了危機不一定是壞事，它表明這一學科的學者不滿足於目前的現狀，而想有所突破，有所前進。」②

本文想從這個意義上來探討一下中國比較文學的突破口和它的前進方向。

一種可戲稱為「三部曲」的傾向

自從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重新崛起以來，至今已有將近八、九年的歷史了。回顧這一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的：(1)影響研究，包括中外文學關係研究；(2)平行研究；(3)比較文學基本理論研究；(4)科際研究。

影響研究和中外文學關係研究進行得最多、最為扎實，成就也最大。當然，這並不是說影響研究就不存在問題，關於這個，本文後面將談到。這裡首先想談的是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問題。回顧近幾年來我國平行研究的一些論文，或隱或現我們都能感覺到某種可戲稱為「三部曲」的傾向，具體地說就是：當比較研究兩部作品、兩個作家或兩個文學現象時，我們往往總是先提出它們「驚人的相似」；然後又指出，儘管如此相似，但還是存在著「深刻的差異」；最後便是尋找產生這種「驚人的相似」的原因，或者說是總結規律，結論無非是「社會背景」不同、「民族特性」有別等等。

筆著並不認為這種「三部曲」的傾向是錯誤的。尋找世界文學中的相似現象，發現文學發展的規律，可以說是萌生比較文學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這種研究完全無可厚非。現在的問題

是，假如我們的研究老是局限於這樣的「三部曲」中，我們的研究如何能繼續深入？這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指出的：「我們現在進行比較文學的研究，總要講上幾句類似『通過比較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的話。這句話並沒有錯，但是找出了規律性的東西，問題就結束了嗎？目的就達到了嗎？我認為還沒有達到。這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必須有點用處，為規律而規律也不見得是正確的。」季先生接著又說：「總之，我們研究比較文學，不要怕人說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幹一件事情有時候必須考慮一下實用，考慮一下功利。」③

這兩段話值得深思，季先生實際上提出了比較文學的目的性問題。而這裡所說的「比較文學」，我覺得主要指的是平行研究。因為影響研究的目的比較明確：揭示文學的國際關係、文學的傳布和接受、作家對異族文學的借鑑和創新等等。平行研究則不然：我們找到了相同現象，發現了相異之處，那又怎麼樣呢？

季先生的「實用」和「功利」說為我們指出了一條出路：我們應該跳出原先比較狹隘的「某某與某某」的比較，而從宏觀的角度看待某些現象，這樣我們就能發現許多有趣而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譬如，中外文學中的藝術形象類型的整理就大有搞頭——假如我們把世界各國文學中的吝嗇鬼形象、流浪漢形象、妓女形象……都能收集起來，分門別類，揭示其各自的特點和魅力，我們便可得到一部獨具一格的《世界文學藝術形象辭典》；假如我們能對世界文學中的主題、母題進行歸納、整理的話，我們便可得到一部很有意思的《世界文學主題史》或《世界文